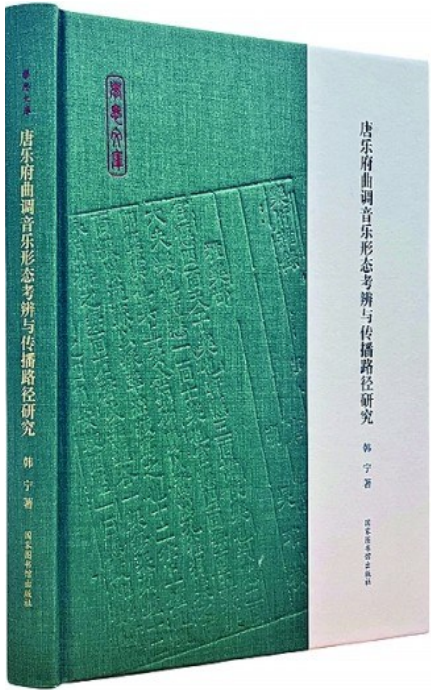


曲调考辨探唐韵

乐府新研溯旧音

——读《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历代乐府诗经过数代学人的艰辛探索，已积累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任半塘、王运熙、萧涤非等老一辈学者，以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这一学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詹锼先生出版了《李白诗论丛》一书，书中收录了多篇有关李白乐府诗的论文，对于其中的《李白乐府探源》一文，詹锼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特别指出：“李白乐府探源只是罗列了一些资料，其实够不上说是一篇论文，因为其中并无任何论点。从这些材料上看，似乎李白的乐府诗都是模拟前人，因袭旧调。其实李白是推陈出新，用旧瓶装新酒，诗中有很多创造的成分。”詹锼先生精准地抓住了李白乐府创作的关键问题，即对汉魏古题乐府曲调的因袭与创新。以李白《将进酒》为例，《将进酒》属汉鼓吹饶歌十八曲之一，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称：“古词曰：‘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闻一多《乐府诗笺》也认为：“此纪宴饮赋诗之事。”汉古辞但言饮酒，而李白的《将进酒》则以酒来挥斥忧愤，他用酒来缓解美好生命与生命苦短、人生易老之间的矛盾，用酒来消解天纵奇才与玄宗倡优蓄之的愤懑，用酒来充填“钟鼓饕玉”生活带来的幻灭感，用酒来开释圣贤的寂寞与纵乐者留名的矛盾。李白《将进酒》既延续了汉魏古调对饮酒场景的书写传统，又突破了古辞的程式化表达，并以强烈且充盈的生命意识重构了诗境，使其成为唐人乐府诗典范之作。由此可以看出，乐府曲调在乐府诗创作中至关重要，乐府诗的发展过程，就是对旧调与新调、古辞与新旨不断碰撞融合的过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

路径研究》一书，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乐府诗的这一发展过程做了扎实的学术研究。

《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作者韩宁已出版三部乐府研究著作，多年来，她专注乐府诗研究，从分类研究到断代研究，再到如今的乐府曲调研究，既与学界研究趋势紧密呼应，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读罢《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一书，有以下几点感受。

首先，在乐府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们对汉魏六朝乐府的起源、发展脉络以及有代表性的曲调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考察，使得乐府研究的框架逐渐清晰。进入21世纪以来，乐府研究又迎来了新的繁荣景象，学界从多个维度对乐府展开深入探究，如乐府诗与中国古代音乐的内在关联、乐府创作的艺术特点、古代乐府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相关文献的整理与校勘等。诸多影响较大的乐府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不仅总结了前人的宝贵经验，更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极大地深化了学界对乐府的整体认识。然而，在宏观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微观研究的相对薄弱却逐渐显现。乐府诗体本身是由众多具体曲调和生动文本构成的丰富体系，让人耳熟能详的诸如《出塞》《昭君怨》《蜀道难》等汉魏乐府旧曲，以及“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汉佚名《陌上桑》）“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梁萧绎《折杨柳》）“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唐李白《行路难》）等经典文本，这些微观元素亦构成乐府研究的核心之一。本书的问世，恰逢其时地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本书聚焦于乐府曲调，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对唐代乐府曲调的音乐文学形态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也提醒我们，在宏观研究之外，微观层面的挖掘同样不可或缺。当前学界虽已积累了丰富的宏观成果，但唯有将目光投向细节，探讨每一个乐府曲调的具体形态，才能真正推动乐府研究向纵深发展，使这一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学术领域绽放出新的光彩。

其次，是曲调研究方面。乐府研究中，曲调研究是学者涉足较少的领域。任半塘在《唐声诗》下册中，对唐乐府声诗的曲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辨，为后世学者树立了标杆。然而自此之后，学界对唐人乐府曲调的集中探讨并不多，相关研究的活跃度有所降低。本书引发了学界对乐府曲调研究的重新关注，该研究不再局限于唐齐言乐府声诗，而是扩展至全部唐乐府曲调，并且其考辨工作深入细致。考辨之难，需要学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严谨的研究态度。本书作者在曲调考辨方面所展现的学术功力，是令人钦佩的。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挖掘和分析，解

决了诸多乐府曲调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澄清了一些错误认知。例如隋唐乐府曲调《何满子》，历来有“何”与“河”两种不同记载，多认为二者系同调，而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认定此为两支不同的曲调。再如唐人乐府曲调《穆护砂》中的“穆护”一词，作者从曲调来源、历史文化背景等多个角度辨析其与“牧护”“木斛”“木瓠”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仅如此，通过这些曲调的考辨，还解决了唐诗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的“剑器浑脱”一语，对其所指历来有争议，作者结合《浑脱》曲调的性质特点，认定其为舞剑所用之曲，同时也包含公孙大娘的舞剑动作。再如，对于唐乐府诗《回波尔》开头固定的“回波尔时”四字，作者并未简单地将其解释为曲水引流泛觞之意，而是考证其保留了佛经翻译的痕迹。这种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在曲调考辨方面取得了诸多创见，更为乐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真正揭示乐府曲调的奥秘。

最后，就唐诗的经典化而言，唐诗的传播与接受，是理解其经典化过程的关键环节。在众多的唐诗传播途径中，乐府诗体凭借其入乐可歌的性质，在唐诗传播中承担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唐诗选本、唐人别集、诗话等文本传播方式，对乐府诗传播的特殊性关注不足。本书从唐乐府曲调的传播路径角度，揭示了唐诗传播的多元维度。作者专门探讨了唐乐府曲调的传播路径，并指出其传播具有全方位、立体化的特点。乐府曲调的传播，不仅涉及音乐形态本身，还与表演方式、帝王喜好、献诗作乐、乐府机构、人员流动、酬唱答谢、文献刊刻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书中详细梳理了唐乐府曲调的四种传播路径：宫廷内传唱、由民间传入宫廷、由宫廷流入民间、宫廷外流传。作者指出：“这四个方面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断的综合过程。传播系统表现得活跃，说明乐曲具有生命力，如果这个系统失灵，那么乐曲就会失传。”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传播系统在唐诗繁荣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我们理解唐诗的繁荣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总之，《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一书在乐府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通过对乐府曲调的深入考辨和传播路径的细致分析，丰富了学界对唐乐府曲调的认识，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的交融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亦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深入发展。

（原载《光明日报》，作者为詹福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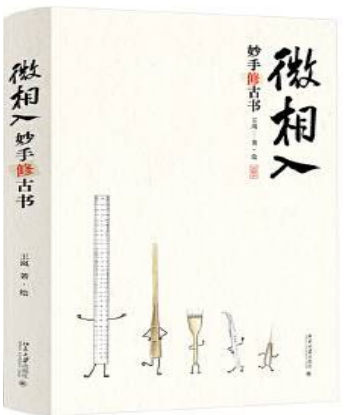
新书推介

《手持人间一束光》



内容简介:作者在送外卖的间隙,把生活中的诗灵感随时记在便签上、废纸上,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一首首感人的诗歌。

《微相入:妙手修古书》



内容简介:这本书围绕古籍文献保护与修复,从“劫、器、纸、修、缘”五个方面,讲述了古籍的破损原因、修复工具、修复用纸、修书方法,以及古籍保护的相关文化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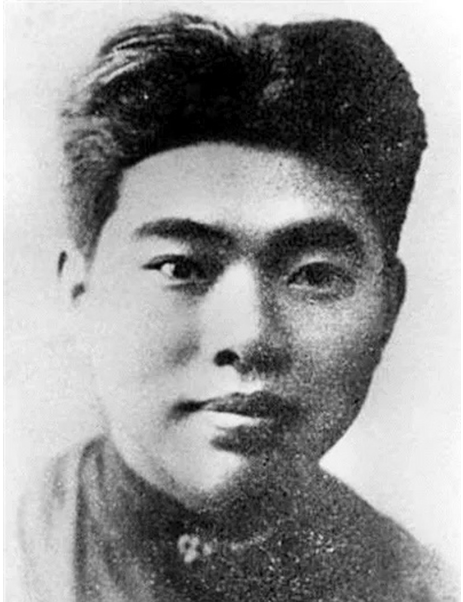
《书苗》



内容简介:小说讲述女孩书苗在“书痴”爸爸的影响下,逐渐喜欢上淘旧书、修古书的故事。一个个穿越历史时空的动人故事,唤起了当代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与热爱。（本报综合）

青年楷模何功伟

——鄂南敌后抗日开路先锋



何功伟，又名何明理，化名何彬、何斌。1915年出生于咸安区桂花镇柏墩村，1941年牺牲于恩施。

（上接第9期）

年会由会长雷荫民主持，几个社友讲过之后，何功伟站起身来发言。他说：“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扶拯社能不能扶拯直上？在你们的心灵里，是不是已经感到苦闷，感到忧虑了？”接着用信心百倍的口气谈到民族危亡固然严重，但坚持抗战的前途是光明无比的。他分析和预测：“即使咸宁、武汉沦陷，日寇也不可能完全打通和控制粤汉线，我们却可以在敌后的鄂南开展持久的抗日游击战，直至最后胜利。”谈到这时，他的眼睛闪烁着希望和坚信的光芒，因势利导地指出：“鄂南是武汉东南的屏障，而咸宁又地处鄂南中心，诸位同学都是土生土长于咸宁，完全可以在家乡宣传抗日，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

何功伟的一席讲话句句扣人心弦。年会上，大家决定：立即设立民众阅览室，开办民众夜校。

随后，何功伟开列书籍清单，派雷同去武汉购买进步书籍和抗日书刊。不几天，柏墩民众阅览室开放了，《论政党》《母亲》《海上述

林》等书籍书刊都摆到桌面上供大家阅览。阅览室吸引了大量附近的学生和店员，也是扶拯社友学习革命理论的阵地。何功伟也常来这里，指导大家阅读，教大家唱他最爱唱的歌：

轰轰轰！哈哈哈哈哈！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

挺起了心胸，
团结不要松，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不久，在何功伟的领导下，柏墩、山南畈和大屋雷村的民众夜校办起来了。每到晚上，留声机一响，前来上夜校的男女老少，一围就是上百人。从武汉刚回的何功伟嗓子好，他向围拢来的民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有时，何功伟亲自赶到夜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国内外形势，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深受民众欢迎。

7月，何功伟先介绍功国、功济和雷同等3人首先加入中国共产党，设立了柏墩支部，雷同任支部书记。过了几天，雷同等人又发展扶拯社社友徐弘毅、胡明哲等人入党。8月，何功伟指示雷同等人扩大扶拯社，吸收新社友，扶拯社由10多人激增到20多人。不久，这些社友绝大多数成了共产党员。这些发展的新党员又随即四路出兵，分头到各地去继续发展党的组织。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咸宁县的共产党员就发展到100多人，建立了柏墩、大幕山区、桃坪、马桥等4个区委，党的有组织的活动几乎遍及全县。

何功伟非常重视对新党员的培养教育工作。在柏墩，他亲自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重点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严肃地要求每个党员牢记党的最高理想和当前的抗日救亡任务，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坚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何功伟同志以他卓越而有成效的斗争，

在咸宁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烈火，培养了革命火种。

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何功伟找到在新四军大岷通讯处的中共阳（新）通（山）中心县委，与黄潜德、潘继汉、林平等组建中共咸宁中心县委，书记何功伟，组织部长潘际汉，宣传部长黄全德。

鄂南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后，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在咸宁、大冶两个中心县委的基础上，组成中共鄂南地区特别委员会（简称鄂南特委），统一领导鄂南10县的工作。1938年8月，中共鄂南特委在咸宁仙人墩正式成立，特委书记是何功伟，组织部长刘青，宣传部长黄全德，特委委员有郭益进等人。鄂南特委建立后遵照党中央关于华中工作的指示以及当时保卫武汉的需要，迅速将党员派往各地。何功楷、钱远镜、李一戎到咸宁。王锡珍（陈约珥）、王佛炳、刘光前到崇阳；张进、江国忠到蒲圻；刘青、黄全德、郭益进、彭济时、胡特庸、侯彦、赵龙骧等到阳新、大冶；黄菊庄、甘佐皋到通城；潘际汉、窦联顺到通山；肖子南、王健民、舒江皋、王水、潘斌、许保民、许大鹏等人到武昌。

在何功伟的领导下，中共鄂南特委在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日的时候，抓住时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一）大力训练干部。早在恢复党组织的初期，鄂南各级负责人就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一方面选派优秀青年去延安抗大、八路军武汉农民训练班、汤池训练班等处学习，另一方面各县县委成立后，通过党员训练班、青年农民训练班、抗日学校形式，培训了大批的干部。如武昌县委王健民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张执一，在武昌龙泉江王村办的抗日学校和崇阳县委王佛炳在华坡办的抗日学校，都办得很好。

（二）积极物色军事干部。开展游击战争，需要懂军事的干部。鄂南特委一方面积极寻

找流散在鄂南的红军干部。如张曙光（汉川人，长征路上被打散后，长期隐蔽在武昌青山咀当长工，在汉川恢复党的关系后，又回到鄂南。）与天汉苏区干部祁曙东。在这一时期归队的红军军事干部还有红军连长王儒林（后更名王苏、王一鸣），红军手枪队班长程贤友等人。另一方面动员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各类人员出来打游击。咸宁县委成功地团结何襄楨，就是动员旧人员的一例。何襄楨当过县保安团长，有军事工作经验，在旧军人中有号召力。特委书记何功伟向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共赴国难。他后来出任了我党领导的咸宁自卫大队二队队长。

（三）四处收集枪支弹药。8月，西北军六十旅旅部设在大冶县委统战部部长冯玉亭家，冯玉亭与该旅旅长很熟。10月中旬，该旅撤往湖南时，将带不走的70多支步枪及一批弹药和军需物资交给冯玉亭。10月下旬，许大鹏等在家乡油坊岭以乡村促进会的名义组织群众收集枪支，他们一面自己捡枪捡子弹，一面从散兵手里买，三五块银元一支步枪，一二十块银元一挺机枪。有一次，他们还从一口水塘里捞起机枪6挺，步枪100多支，子弹近万发。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收集步枪400多支，机枪20挺。在这期间，中共咸宁、崇阳、武昌县委也组织收集了一批枪支子弹。

在此期间，何功伟亲自参与了咸宁县人民抗日武装的组建，并在挂榜山直接领导首次战斗。

8月中旬，何功伟召集雷同等人在柏墩中田畈召开党的会议，研究建立抗日武装准备工作。会上，何功伟强调指出来三个问题：一是与会者要动家里带头，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保证人民武装的给养；二是要发动在大革命中打冲锋的人员或其亲属，踊跃参加抗日武装，并以他们为骨干；三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士绅，利用各方面的关

系，联合建立抗日武装。

与会者都同意何功伟的意见，并一致认为，家住中田畈的巨绅何襄楨，虽然过去曾一度反共，但具有爱国思想，支持抗日，而且很有影响，也懂军事，应该把他列为重点“统战对象”。

何功伟主动去做何襄楨的工作，向他宣传我党全民抗战的主张，诚恳地动员何襄楨共赴国难。何襄楨深受感动。

1938年10月18日至11月9日，鄂南各县相继沦陷。1938年10月18日、20日，阳新、大冶县城陷落。日军又兵分三路进犯：一路沿富水进攻通山；一路沿三溪口、杨畈进攻咸宁；另一路经大冶向金牛、贺胜桥进犯。第九师团于29日占领咸宁县城，30日侵占汀泗桥。到11月4日，汀泗桥、柏墩、小岭相继失守。

咸宁沦陷后，国民党军队蜂拥南溃，日寇的飞机在咸宁狂轰滥炸，烧了咸宁城，又烧柏墩街；他们在公路沿线设了一个个据点，扯起了一面面太阳旗。就在咸宁城沦陷的当天，何功伟同志带领一支人马，扛起了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登上挂榜山，举起了人民武装抗日的战旗。此时，何襄楨毅然把自己的衣袍剪短，加入抗日武装的行列。何功伟请他做队长，带着大家一起在山林里练兵。

11月初的一天，哨兵报告：日寇的一个小分队，朝着鸣水泉的方向袭来。何功伟、何襄楨和雷鸣等人带着游击队员，立即赶到鸣水泉边的山头，作好伏击日寇的准备。

鬼子靠近鸣水泉。

“打！狠狠地打！”何功伟下达了向日寇开火的命令。顿时，千百发仇恨的子弹迸然而出，“噼噼啪啪”的枪声震荡着山谷。鬼子乱作一团，他们没有想到就在离据点几里路的地方，会杀出一支抗日人马。鬼子兵盲目地还击了一阵，不敢恋战，狼狈而逃。

“伏击成功！”队员们高兴地庆祝这一仗在鄂南打响了抗日游击战争第一枪。

《何功伟烈士传》连载⑩

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主办